

掘愛傷痕（Our Mothers）

影片介紹

《掘愛傷痕》是瓜地馬拉導演塞薩爾狄亞（César Díaz）執導的劇情片，以瓜地馬拉的內戰歷史與轉型正義為背景，描述一名在法醫鑑識中心任職的青年艾納多（Ernesto），在開挖、鑑識獨裁統治時期受難者遺骨的日常工作中，尋找自己失蹤父親的下落。

有一天，一位遠道而來的馬雅老婦人請求艾納多幫忙尋找 20 年前遇害的丈夫，她的丈夫及其他村民因曾幫助游擊隊員而被政府軍隊凌虐、殺害。艾納多在老婦人提供的相片中，發現其中一名游擊隊員，很可能就是當年下落不明的父親。尋找父親遺骸的過程中，艾納多也意外挖掘出母親和其他婦女們難以啟齒的傷痛經歷。

儘管《掘愛傷痕》的劇情並未詳細著墨瓜地馬拉獨裁統治的歷史，卻仍能透過片中所呈現的瓜地馬拉轉型正義相關工作，如對於當年獨裁者的起訴與公開審判、挖掘遭到屠殺的受難者遺骨、記錄見證者的證言、給予受難者家屬賠償金等過程，窺見獨裁統治時期政府軍的暴行與游擊隊民兵的抵抗。與此同時，也帶出瓜地馬拉充滿韌性的女性倖存者，在種族與性別雙重弱勢身分交織下，長期被迫噤聲的處境。

背景介紹：瓜地馬拉「沉默的大屠殺」

瓜地馬拉在一場 1954 年的政變後，民選的阿本斯總統（Jacobo Arbenz Guzmán）被推翻，自此陷入獨裁統治與內戰中，至少 20 萬人在這段血腥歷史中喪生。1960 年起，不滿獨裁政權的左翼農民組織武裝游擊隊，與政府軍展開長達 36 年的交戰，直到 1996 年雙方才簽署停戰條約。而瓜地馬拉的內戰不只是左右翼之爭，以白人為主的政府軍更以「反共」為名行種族滅絕之實，針對原住民馬雅人展開種族屠殺，又稱「沉默的大屠殺」。

由於馬雅人多居住於山區、叢林等較偏遠的地區，這些偏遠地區又經常成為游擊隊的藏身之處，因此政府軍便以懷疑原住民藏匿游擊隊為由對馬雅人展開殘忍的報復屠殺，許多男性失蹤、遭到殺害，女性更長期活在被性侵、凌虐的陰影下。根據調查，在瓜地馬拉內戰期間，至少有 10 萬名婦女遭到性暴力，其中就有超過九成是原住民馬雅凱克奇族人（Q'eqchi'）。

屠殺的情況在 1982 到 1983 年間李歐斯·蒙特（José Efraín Ríos Montt）透過政變躍升瓜地馬拉總統的期間達到高峰。蒙特採取恐怖統治手段，除了逮捕政治異議人士外，更指使或放任手下軍隊迫害馬雅平民。在《掘愛傷痕》中，多位馬雅老婦人耐心地排著隊，向艾納多娓娓道來數十年來都無法言明的遭遇，即透露了 1982 年政府軍對馬雅人大肆進行屠村與性暴力的殘酷情形。直到 1983 年後，蒙特因其手下政變而下臺，瓜地馬拉開啟民主化之路，馬雅人的受迫處境才逐漸緩解。但長年的種族歧視、屠殺迫害及流離失所，導致馬雅人至今仍是瓜地馬拉社會中相當弱勢的群體。

1999 年聯合國所支持的瓜地馬拉「歷史澄清委員會」（La Comisión para el Esclarecimiento Histórico, CEH）於調查報告中證實，在該國內戰中，大部分侵害人權的暴力行為都是政府軍所為，且受害者幾乎都是馬雅人，尤其是蒙特擔任總統任內針對馬雅人的高度迫害，已構成種族滅絕行為。而這份調查報告以及後續被釋出的軍方檔案，成為 2012 年瓜地馬拉檢察總長以「種族滅絕罪」及「危害人類罪」起訴前獨裁者蒙特的主要依據；此外，也有部分軍官因當年屠殺和性侵的暴行被判刑，承擔法律和道德上的責任。

在民主化後，瓜地馬拉政府開始在各地挖掘受難者的遺體，幫助親屬尋找、比對在當年屠殺下失蹤的摯愛，並給予一定額度的賠償，如同《掘愛傷痕》主角艾納多的日常工作，除了協助受難者遺骸回家，也透過口述

歷史的記錄，讓倖存者的傷痛遭遇得以被肯認。同時，這些掩埋遺體的地點，與倖存者描述當年監禁、刑求、屠殺、強暴發生的場域，皆成了國家暴力的空間證據。

儘管威權統治留下的歷史傷痕一時之間難以抹滅，但瓜地馬拉透過釐清歷史真相、紀錄倖存者證言、直視受難家庭的傷痛、識別並追究加害者責任等措舉，對於獨裁時期國家暴力帶來的傷害表達反省，已跨出轉型正義的一大步。

探討議題：女性倖存者

瓜地馬拉和臺灣及其他許多前獨裁國家一樣，都在1980年代前後經歷了民主化的浪潮，但是威權統治時期留下的歷史記憶與創傷，並不會隨著獨裁體制的瓦解就一夕消失。為了治癒歷史傷痕，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會透過「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行動，對於過去獨裁政權大規模侵害人權的不正義作為進行究責與彌補，期望能夠平撫社會傷痛，並謹記歷史教訓，防止侵害人權的事件一再重演。推動轉型正義的具體作法，其中包括調查歷史真相、保存並紀念歷史記憶與相關事件遺址、賠償受害者、追究加害者、改革壓迫體制、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平復等。

《掘愛傷痕》劇情中不時穿插著女性倖存者在法庭上作證的電視畫面或廣播聲音，而艾納多的母親最終也在他的說服下，選擇勇敢站上法庭，揭露自己當年遭到監禁、刑求與性暴力的創傷經歷，指控獨裁者與政府軍犯下的暴行。

當人們大多聚焦於威權統治歷史中遭到政治迫害的男性，忽略女性處境時，本片反而呈現女性在國家暴力下遭受的身心創傷，並且為遇害的男性親屬留下證言，成為日後追求歷史真相的主體的一面。她們堅毅又充滿韌性的生命歷程，值得鎂光燈的關注。

一般提及國家暴力時，容易聯想到的是監禁、刑求、死刑等公權力對政治受難者肉體所造成的直接傷害。但事實上國家暴力造成的傷害並不僅限於受難者本身，也不僅止於政治案件發生的當下，即使在許多政治案件中遭殺害或監禁的受難者多為男性，但受難者女性親屬長期承受的生活壓力、汙名化、孤立與隔絕，所帶來的傷害也同樣是政治創傷，需要在轉型正義的過程中被重視及療癒。

此外，由於轉型正義包含對於歷史真相的調查，欲釐清歷史真相，除了需要爬梳相關史料檔案，也需要透過見證者口述內容的相互補充及佐證。因此，就像《掘愛傷痕》中的馬雅老婦人透過艾納多的訪談道出政治案件的發生經過與發生地點、協助建構更完整的歷史樣貌，推動轉型正義時，政治受難者的親屬——無論是在口述歷史訪談中，或是政治案件的平反運動中——都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聚焦臺灣：阮美姝與張捷

距離臺灣有半個地球之外的瓜地馬拉相當遙遠，然而當時瓜地馬拉政府跟中華民國的關係比我們想像的緊密許多。中華民國在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後，經歷了一波斷交潮，為了拉攏意識形態相似的中南美洲獨裁政權，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為其積極提供經濟及軍事訓練援助，瓜地馬拉便是其中之一。

1970年代後許多瓜地馬拉的軍官曾被招待來臺，在北投的政治作戰學校以西班牙語進行政治作戰訓練。中華民國也派員在瓜地馬拉為軍政府人員傳授政治理念、反叛鎮壓、政戰及酷刑拷問技巧等相關訓練。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鞏固統治的經驗，成為瓜地馬拉等政權效仿的對象。然而在極權背後，無論是臺灣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或是瓜地馬拉的內戰歷史，都對社會留下橫跨數世代的傷痛。

前述女性見證國家暴力的發生、為男性受難親屬留下證言，並一生致力追求真相，這些狀況也在臺灣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女性親屬身上看見。阮美姝是《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的女兒，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她正好去探望因氣喘而臥病在床的父親，親眼看見父親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杳無音訊。她一直相信父親還活著，只不過被關在某處；直到後來赴日留學，才從其他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所撰寫的書中，得知父親早已因叛亂罪被槍決。在那個談論二二八事件仍被視為禁忌的年代，她不畏壓力四處奔走，窮盡一生追查父親遇害的真相，並訪談許多跟她有類似境遇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留下珍貴的口述歷史。

二二八事件期間，曾多次入選「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嘉義畫家陳澄波，被「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推舉為談判「和平使」，與盧鈞欽、柯麟、潘木枝等參議員進入水上機場和談，希望平息事端，卻遭國民黨軍隊逮捕，未經審判，3月25日遊街至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決示眾。當時的肅殺氛圍，沒有任何醫師敢開立死亡證明，也沒有診所或醫院願意出借擔架，陳澄波的妻子張捷拆下家裡的門板，將遺體抬回家中，特別找攝影師為陳澄波的遺體拍照留下紀錄，並將陳澄波身上留有彈孔的血衣仔細清洗保存，在民主化之後，她悉心收藏的遺體照片與血衣，皆成為國家暴力的重要史料證據。

瓜地馬拉與臺灣在地理上雖然遙遠，但對於曾經歷國家暴力的受難者及其親屬來說，他們長年承受的政治創傷及對歷史真相的追求，卻意外地相似。轉型正義像是一道連結世界上許多前威權國家的橋樑，透過對照彼此在民主化過程中面對威權遺緒、從國家暴力創傷中復元的經驗，重新思考普世人權價值的重要性，並且作為不同國度的歷史借鏡，防止威權捲土重來。

延伸閱讀：

阮美姝（1996）《幽暗角落的泣聲》。臺北：前衛。

沈秀華（2020）《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臺北：玉山社。